

# 从批判理论到生态马克思主义： 对马尔库塞、莱斯和阿格尔的分析

郇庆治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871)

**摘要:** 从马尔库塞、莱斯到高兹,他们在把法兰克福学派对发达工业社会的哲学文化批判转变成为一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批判的同时,把古典马克思主义意义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变成为一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生态学批判。基于此,当时任职于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本·阿格尔在 1979 年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导论》中,将莱斯的两部著作盛赞为对一种生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最清楚、最系统表述”,并宣布了生态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新支派和环境政治社会理论新流派的诞生。

**关键词:** 批判理论;生态马克思主义;马尔库塞;莱斯;阿格尔

**中图分类号:** B0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4)03-0042-09

## From Critical Theory to Ecological Marxism: Analyzing Marcuse, Leiss and Agger

HUAN Qingzhi

(School of Marxism,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From Marcuse, Leiss to Gorz, they changed the Frankfurt School's cultural critique of philosophy to the developed industrial society into a realistic critique of the capitalism system, meanwhile they changed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 in the classical Marxist sense in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logy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 Based on this, i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estern Marxism* published in 1979, Agger, who worked in University of Waterloo, Canada at that time, highly praised two works written by Leiss as "the clearest, most systematic interpretation" on a view of Ecological Marxism and announced the birth of Ecological Marxism as a new tribe of Western Marxism and a new genres of environment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Key words:** critical theory; Ecological Marxism; Marcuse; Leiss; Agger

詹姆斯·杰克逊(James Jackson)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界定,应该是我们迄今所见的最明晰的定义。他指出,“生态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严厉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内在地破坏人与自然的联系,‘民主资本主义的经济是与自然的保护不相容的’。在马克思看来,解决环境恶化难题和工人悲惨境遇的唯一出路,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的人类解放概念,是与他通过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来克服人类与自然分离的思考相联系的。‘要想摆脱人类的异化状态’就必须‘以一种理性的方式控制与自然的物质代谢’,而这种目标只有在根除资本

收稿日期:2014-02-10

作者简介:郇庆治(1965-),男,山东青州人,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环境政治和欧洲政治。

主义之后才能实现”。<sup>[1]</sup>可以看出,这种定义性阐释,不仅提出了对当代资本主义本身的最严厉的生态学批评,而且提出了一种“生态社会主义”的总体性解决思路——不仅仅是在哲学批判的意义上,而是同时在政治斗争与经济社会重建的意义上。这也构成了我们理解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批判理论向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环境政治社会理论过渡的坐标参照。本文的目的是依此对马尔库塞、莱斯和阿格尔的思想流变做一种重新梳理与阐释。

## 一、马尔库塞的“自然危机”与“自然解放”理论

在《论解放》(1969)和《反革命和造反》(1972)等晚年著作中,<sup>①</sup>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 1898~1979)以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依据,阐述了对当时欧美社会面临着的生态环境难题的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解与回应。

1. “自然危机”、“生态危机”已成为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而科技扮演着从生态环境破坏到意识形态控制的多重角色

一方面,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现代工业社会中人们面临的一个严重影响生活质量与生存的威胁。“拥挤不堪,噪杂和无可奈何地凑合在一起,是人海社会的特征。这种情况促使人们渴求‘安静、隐居、独立、主动和行动自由’,而这一需要……是‘真正的生物学上的必需’。缺乏这些东西会使本能结构受到损害”,<sup>[2](p9)</sup>“大气污染和水污染,噪声,工业和商业强占了迄今公众还能涉足的自然区,这一切较之奴役和监禁好不了多少”。<sup>[2](p129)</sup>“商业化的、受污染的、军事化的自然不仅从生态的意义上,而且也从生存的意义缩小了人的生活世界。它妨碍着人对他的环境世界的爱欲式的占有(和改变):它使人不可能在自然中重新发现自己。”<sup>[2](p128)</sup>“攻击进入生活本能的领域,使大自然越来越屈从于商业组织。……景色本来可以是性本能的天然空间:安宁、幸福和美的感官世界;避开和抵挡资本的权力,避开和抵挡交换价值的权力;没有价值作用的世界——一句话,就是心满意足。……商业扩张和商业人员的暴行污毁了大自然,压抑了富有生命力的性本能的浪漫梦想。”<sup>[2](p16)</sup>

可以看出,马尔库塞在清楚看到生态危机或生态挑战的普遍性、严重性的同时,也明确强调了这是一种人们的生活质量与生存的问题,或者说,是人的解放进程遭遇障碍或扭曲的问题。

另一方面,生态环境问题是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内源性结果。“在现存社会中,越来越有效地被控制的自然已经成了扩大对人的控制的一个因素:成了社会及其政权的一个伸长了的胳膊。”<sup>[2](p128)</sup>“现存制度还只能靠对资源,对大自然,对人的生命的全面毁灭而维持下去。”<sup>[2](p85)</sup>“我们社会的突出之处是,在压倒一切的效率和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准这双重的基础上,利用技术而不是恐怖去压服那些离心的社会力量。”<sup>[3](p2)</sup>“政治意图已经渗透进处于不断进步中的技术,技术的逻各斯被转变成依然存在的奴役状态的逻各斯”,而这种技术理性统治“正在产生更高的合理性,即一边维护等级结构,一边又更有效地剥削自然资源和智力资源,并在更大范围内分配剥削所得”。<sup>[3](p145)</sup>现代“科学是一种先验的技术学和专门技术学的先验方法,是作为社会控制和统治形式的技术学”。<sup>[3](p144)</sup>“不仅是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sup>[4](p106)</sup>

应该说,稍早的马克斯·霍克海默和西奥多·阿多诺,就已对科技扩展导致的人和自然关系异化及其自身的意识形态化演变,提出了严厉的学术批评。比如,“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但是,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sup>[5](p1)</sup>“人对自然界的统治的代价是劳动在社会上和心灵上的划分,这种分工使人类受到越来越大的压迫,甚至当它在为人类的解放创造日益增长的潜力时也是如此”,“所以,虽然启蒙精神的理性主义提高了人统治自然的力量,但和这种作为罪恶之源的劳动分工一起的,是人同自然的异化”。<sup>[5](p110)</sup>“不仅形而上学,而且还有它所批判的科学,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后者之所以也复如是,是因为它保留着一种阻碍它发现社会危机真正

<sup>①</sup> Herbert Marcuse, *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 (Boston: Beacon Press, 1972); *An Essay on Liber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69). 198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赫伯特·马尔库塞等的《工业社会和新左派》(任立编译),依次包括了《当代工业社会的攻击性》和《反革命和造反》两文。

原因的形式。说它是意识形态的,并不是说它的参与者们不关心纯粹真理。任何一种掩盖社会真实本质的人类行为方式,即便是建立在相互争执的基础上,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sup>[6] (p5)</sup>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技术理性,“已经成为万能经济机器的辅助工具。理性成了用于制造一切其他工具的工具一般,它最终实现了其充当纯粹目的的工具的夙愿”。<sup>[5] (p27)</sup>

但明显不同的是,马尔库塞更加强调了现代工业社会中生态环境问题的内在必然性,即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与文化之间的联系,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工具理性和政治依附性所导致的自然生态损害、主体压抑和社会单向度特征。“对人的统治要借助于对自然的统治:今天,人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之间的具体联系在激进运动发动的重要的生态进攻中可以看得很清楚。”<sup>[2] (p129)</sup>相应地,“当新左派坚决为自然的重建,为开放公园和海滩,为宁静区域而斗争的时候,……他们反对的乃是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再生产强加在人头上的物质关系”。<sup>[2] (p93)</sup>

## 2. “自然危机”、“生态危机”的消解之道是诠释与重构马克思的“自然解放”、“人的解放”理论

为了寻找破解现代工业社会中“自然危机”、“生态危机”的思想资源,马尔库塞回到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的解放”和“自然”概念。马尔库塞发现,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是一种相互促动的过程。而自然的解放同时包含着两个维度:一是人自身的自然的解放,二是人身之外的自然的解放。

马尔库塞提出,把自然的解放重新变成人的解放的途径或手段的前提是,恢复马克思关于自然界主体地位的看法。他强调,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与自然界互为主体,自然界“将不单纯作为材料——有机的或无机的物质而出现,而是作为独立的生命力,作为主体—客体而出现;对生命的追求是人与自然的共同本质”。<sup>[2] (p132)</sup>也就是说,自然是一个“活的对象”、一种有“主体性”的客体。自然的存在既是“为了它自己”——主体性,同时也是“为了人而存在”——客体性。但是,“自然是没有目的论的,没有‘计划’,没有‘目标’的主体”。<sup>[2] (p133)</sup>也就是说,自然并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与人同等意义上的主体。将自然视为主体,仅仅是人类主体所赋予的,甚至可以说,自然的主体地位,“乃是人的解放的手段”。

在马尔库塞看来,一旦承认了自然界的这种主体地位,就必然会把自然的解放视为人的解放的手段。这是因为,自然的解放除了可以使它成为享乐的工具、推动社会的变革,还可以促进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起一种新型的关系、可以培养人的新的感受力。<sup>①</sup>

尤其是,马尔库塞强调了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的“马克思的生态学”的三个基本观点:<sup>①</sup>

一是“对自然的人道的占有”。在马尔库塞看来,马克思《手稿》中所说的“对自然的人道的占有”,是指把自然变为符合人的本质(作为类存在)的“环境世界”。<sup>[2] (p131-132)</sup>马克思的原话是“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的人,是“有形体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对象”。<sup>[7] (p120-121)</sup>也就是说,人总是要把自然界作为自己的对象,总是要把自己的能力对象化在自然界中,也即总是要在某种意义上“占有”自然界。问题只在于,我们要使我们的“占有”做到“符合人的本质”。

那么,什么样才算是“符合人的本质”的“人道占有”呢?马尔库塞描述道“和资本主义对自然的剥削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对自然的‘人道的占有’是非暴力的、非毁灭性的:目标是自然内在的、能提高生活的、感性美的质。发生了这样的变化以后,‘人化’的自然就迎合人对满足的追求,没有‘人化’的自然就不可能得到满足。对象具有自己的‘内在的尺度’:这一尺度是在它们之中的,对它们来说就是一种内在的潜力;只有人才能将它释放出来,因此也是人固有的人的潜力。”<sup>[2] (p134)</sup>

二是“为了物而同物发生关系”。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的“为了物而同物发生关系”的观点,是对“自然的人道的占有”思想的重要补充与矫正,值得特别注意。在马克思看来,人之所以同物——自然界发生关系,一方面是为了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物——自然界本身。如果忘记了后者,人就不可能实现解放自然的目标,也就不可能实现自我解放的目标。更具体地说,我们不能只是把自然界当作一种材料、无机物质或有机物,还要把它当作一种有生命的主体。

当然,马尔库塞也明确承认,“为了物而同物发生关系”比“对自然的人道的占有”或者说,“人道地

① 具体概括与阐述可参见陈学明《谁是罪魁祸首:追寻生态危机的根源》,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37~438页。

对待自然”比“让自然为实现人的本质服务”更难做到。在他看来,根本原因就在于长期以来人类社会所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自然支配意识,而解决途径则是确定自然的主体地位。

三是“按照美的法则来塑造对象性的世界”。在马尔库塞看来,马克思所说的“按照美的法则(即自由的人的实践的专门特征)来塑造对象的世界”,是正确地处理与自然界关系的根本原则。他进一步解释说,按照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理解,“按照美的法则来塑造对象性的世界”,就是对外部自然界进行“美的还原”,即把外部自然界还原为这样一种状态:在这一状态下,它具有自由的形式和特征。“如果艺术还原成功地把控制与解放联结起来、成功地指导着对解放的控制,那么在此时,艺术还原就表现在自然的技术改造之中。在此情况下,征服自然就是减少对自然的蒙昧、野蛮及肥沃程度——也暗指减少人对自然的暴行。”<sup>[3](p218)]</sup>

可以看出,一方面,马尔库塞对马克思思想的生态学意蕴的阐释是基本准确的,尤其是,他显然是站在一种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之上的。这使得他在正确地遵循了一种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立场与政治立场——主要关注点是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人的解放和如何使自然解放成为人的解放的工具/同盟——的同时,逐渐接近一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生态学批评,或者一种生态的马克思主义。“自然的解放力量及其在建设一个自由社会时的重要作用的发现将成为推动社会变化的一支新力量。”<sup>[2](p127)]</sup>解放自然,则最终是要“使它与人们一起生活在一个共同的人的世界里”。

另一方面,无论是“自然主体”概念还是“为了物而同物发生关系”、“按照美的法则塑造对象性的世界”原则的阐发,尤其是对马克思“占有”概念的善意批评——“马克思的人道地占有自然的思想还始终包含有狂妄的统治欲在内”,<sup>[2](p135)]</sup>都包含着一定的现代环境哲学与伦理的意蕴,从而显示了作为一种政治生态学的生态的马克思主义的革新性维度。比如,同时作为主体的自然,或者有着自己的可能性、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自然世界,以及人类为了物而同物发生关系的理由,等等,几乎要触及自然生态本身的非物质或独立性价值问题。而且,尽管马尔库塞在谈论自然的解放可以使它成为享乐的工具时仍然指的是人的审美感性的重要性和个性全面发展,但实际上也已涉及自然界本身的美感特性——“重新发现它那提高生活的力量,重新发现那些感性的美的特质,这些质对在无休止的竞争中浪费了的的生命来说是陌生的”。<sup>[2](p128)]</sup>

### 3. “自然革命”、“自然解放”是实现现实社会变革的必由之路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在马尔库塞看来,实现“自然解放”的目标需要一场深刻的“自然革命”、“生态革命”,但是,“自然革命”、“生态革命”却不能只在自然界和生态领域中展开,而是必须在广泛的经济、社会、科技和军事领域中同步进行。

在经济生产领域,要同时采取针对“过度消费”和“过度生产”的革命性变革。过度消费既包括超出了自然界承载能力的种种消费现象,也包括了市场经济体制下造成的各种扭曲性、虚假性的“异化消费”。马尔库塞深刻指出,消灭“过度消费”、“异化消费”是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需求观的重大革命。这一革命的性质“既不是单纯地扩大满足现有范围内的需要,也不是把需要从一个较低的水平提高到一个较高的水平,而是要同这种范围决裂,是质的飞跃。革命就是文化的和物质的需要和追求的剧烈改变;意识的和感性的,劳动过程的和业余时间的需要和追求的剧烈改变”。<sup>[2](p92)]</sup>在生产方面,马尔库塞认为,由于“过度生产”是建立在资本、资源和人口高度密集基础之上的,而且是反生态、破坏自然的,因而必须要用一种分散化、民主化的生产来取代目前的集中化大规模生产。在科技方面,改变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是“生态革命”、“自然革命”的中心环节。在马尔库塞看来,就像生产和消费领域的革命并不意味着退回到物质贫困的过去一样,科技发展方向的变革并不意味着倒退到前技术时代。但是,必须意识到,人类已经从过去的防御性或被迫服从于自然抉择的位置,上升到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甚至足以毁灭整个地球的新位置。这就要求人类必须承担起自然界的守护责任,意味着科技发展的方向性调整。“技术进步的这种新方向将是既定方向的突变,即不仅仅是流行(科学和技术)合理性量的渐进,而更确切地说是流行合理性的突变,是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新观念的突现。”<sup>[3](p208)]</sup>

此外,马尔库塞还强调了控制人口增长和反对军备竞赛的生态意涵。就前者而言,他认为,人口过快增长是“自然危机”、“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而节制生育是控制人口增长的唯一可行办法。就后者

来说,在他看来,军事集体之间的军备竞赛,尤其是核军备竞赛,是对自然界的重大威胁,因而必须在反军备竞赛的基础上建立世界和平新秩序。

应该说,无论是针对现代工业社会中经济生产领域和科技发展领域的革命性变革,还是具有强烈时代色彩的控制人口增长和抑制军备竞赛呼吁,马尔库塞关于“自然革命”、“解放自然”的系列主张,都构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革新或革命方案。就其生态学意涵而言,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大众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以及科学技术的渐趋商业化、军事化屈从,日益被证明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无法医治的痼疾。20世纪70年代初马尔库塞基于批判理论的哲学政治学分析,可谓是真知灼见,并奠定了生态马克思主义重要而正确的理论基础。

当然,即便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看,马尔库塞的方案也还不是一个生态社会主义的替代方案。他关于“自然革命”、“生态革命”的提法本身就是有局限的,也没有明确将其政治主张概括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替代。至于对工业社会制度进行反抗和造反的现实力量,他仍然徘徊在形成中的新左派和新人的新感性之间。而事实证明,20世纪60、70年代活跃一时的新左派,并没有成为一种可能的“红绿”大左翼运动的政治领导者,而工业社会制度抗争与抗拒中“一种新型的人的诞生”,<sup>[2] (p131)</sup>更是一个复杂艰难的过程。

## 二、莱斯的“自然的控制”和“较易于生存的社会”理论

威廉·莱斯(William Leiss, 1939~)师承于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和“自然危机”、“自然解放”等绿色左翼理论,并在1969年定居加拿大后提出了自己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而相继出版的《自然的控制》(1972)和《满足的极限》(1976)两部著作,<sup>①</sup>则是他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主要代表作。

### 1. 生态环境问题或危机的根源在于“自然控制(统治)”的观念

20世纪70年代初,基于社会批判理论的视角,莱斯已很容易看到把生态环境挑战仅仅视为一种经济核算问题的局限性。他强调指出,“这其中有两个强有力的社会机制在起作用:市场取向标准的普遍性和对工业技术革新能力的崇高信仰”,<sup>[8] (p1)</sup>而“把环境质量问题的归属无所不包的经济核算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陷阱”,倘若相信它就会成为“落入陷阱的牺牲品”,“结果是完全把自然的一切置于为了满足人的需要的纯粹对象的地位”。<sup>[8] (p3)</sup>但另一方面,莱斯也明确地指出,不能像马克思·舍勒(Max Scheler)等主流科学家那样,把科学简单界定为本质上就是一种控制性知识。他认为,“控制学的概念是不完全的,因为如果这其中的‘控制’一词的含义没有弄得更清楚的话,我们就不能领会科学和技术作为获得对自然的控制的工具而起作用的意义”。<sup>[8] (p106)</sup>

在莱斯看来,科学技术之所以承担起了控制自然的功能,背后还有着更为深刻的思想根源,这就是千百年流传下来的人们头脑中的控制/统治自然的观念。正是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是造成生态环境问题的真正成因,也是我们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关键。

需要指出的是,莱斯认为,控制自然观念的问题,不仅在于思考“自然”与“社会”在方法论意义上的分离(社会才是唯一有意义的和发展的领域,而自然只不过是社会的支撑结构),也不仅在于“在由‘征服’自然的观念培养起来的虚妄的希望中隐藏着现时代最致命的历史动力之一: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sup>[8] (p6)</sup>而在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使这种自然与社会的分裂或控制自然与控制社会的密不可分成为一种内源性的逻辑。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社会需要人们以一种分裂或对立的方式来理解看待自然,需要借助对自然的控制来实现对人的控制。更进一步地说,虽然控制自然的观念并非始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但只有在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才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政治问题。

应该承认,指出并批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控制自然与控制人之间的密切联系,并非始于莱斯。比如,霍克海默就详细论述了理性对外部自然的控制与对内部自然的控制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把人类历史的三个特征即对自然的控制、对人的控制和社会冲突连结在一起。莱斯高度称赞了霍克海默的上述观

<sup>①</sup> William Leiss, *The Domination of Nature* (Boston: Beacon Press, 1972); *The Limits to Satisfaction: An Essay on the Problem of Needs and Commoditie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6).

点,并特别强调了其“自然的反抗意味着人性的反抗”的看法。“更大的压力相应地产生更加猛烈反抗的暴发;在现代社会中对外部自然和内部自然两方面实行的控制程度的扩大,也是自然反抗潜能加强的尺度。”<sup>[8](p144)]</sup>“自然反抗的观念表明,在扩大控制的过程中存在着内在的界限”,<sup>[8](p144)]</sup>“在一种不同的意义上自然反抗的概念可以应用到自然环境的生态的破坏。在对外部自然本身不合理开发中也存在着固有的界限。……如果事实上自然环境不能宽容目前不合理的技术应用水平,不承受支配它的自我更新循环的机制的破坏,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谈论伴随人性反抗而发生的外部自然的反抗”。<sup>[8](p145-146)]</sup>

那么,应如何终结或超越这种自然控制的意识形态化观念呢?莱斯认为,既不能简单化地宣称一种反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自然的解放”(比如法西斯主义主张的反理性主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主张的自然主义的社会主义),也不能无原则地宣称一种同样是反意识形态意义上的“与自然和谐”(将其仅仅作为对现行行为方式普遍不满的一种手段),而是要赋予“控制自然”概念以新的内涵。“控制自然的观念必须以这样一种方式重新解释,即它的主旨在于伦理的或道德的发展,而不是科学和技术的革新。从这个角度来看,控制自然中的进步也同时是解放自然中的进步”,“控制自然的任务应当理解为把人的欲望的非理性和破坏性的方面置于控制之下。这种努力的成功将是自然的解放——人性的解放:人类在和平中自由享受它的丰富智慧的成果”。<sup>[8](p168)]</sup>他进一步认为,从道德角度来分析对自然的控制,人类面临的最迫切挑战不是征服自然,而是发展能够负责任地使用科技手段的能力,以及培养和保护这种能力的社会制度。“在这种新的意义上的统治自然的世俗基础将是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中公民广泛地享有责任和权力,所有的人都被鼓励发展他们的批判能力。”<sup>[8](p172)]</sup>

由此可见,莱斯对于自然的控制观念的革新之处在于,他自觉坚持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哲学政治立场,不仅明确指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自然的控制观念的表现及其经济社会根源,而且同样明确地强调了一种新型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对自然和人类之间关系进行合理控制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一方面,莱斯所强调的控制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主要内容是限制人的欲望中的非理性和破坏性的方面,负责任地运用科学技术的力量,以及创建保障人们负责任地使用科技力量的能力的社会制度,彰显了莱斯思想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意涵。尤其是,他对伦理道德层面集体意识革新重要性的关注,更加突出了其理解的现代环境哲学与伦理色彩。另一方面,他对自然概念、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一般性理解,都是明确地以对马克思恩格斯相关著述的文本诠释为依据的。他对《德意志意识形态》、《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等的引述和阐释,使其不仅很容易地得出了改变人的控制自然的观念必须与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相结合的政治正确结论,也原则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诸多论述中所呈现出来的对控制自然的肯定甚至是赞赏态度。对于前者,他接受“人努力去改变自然以满足自己日益增长的需要”,自由的实现在于“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使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sup>[9](p928)]</sup>对于后者,他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本身是对圣西门观点的深化与发展(“工业化的基础将给人类带来美好的未来”)。

## 2. 走向一个“较易于生存的社会”

作为《自然的控制》的续篇,《满足的极限》系统阐述了一种生态社会主义的替代性方案,即明显不同于当代资本主义大众消费社会的“简易生活社会”或“较易于生存的社会”(the conserver society)。

莱斯理论建构的起点是一个多世纪前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提出的关于创建“稳态经济”的论述。他非常欣赏穆勒提出的,“由量的标准转向质的标准是未来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事情”,<sup>[10](p104)]</sup>并认为,实现稳态经济应成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未来社会蓝图。

莱斯认为,穆勒的上述看法实际上是广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内部(包括马克思本人)的一个非正统的“隐蔽传统”。“这些思想家决不仅仅只关注高度集约的市场布局本身。他们的实际理想共同关注的中心,一直是这样一种假设,即社会改造可以使一切个人的劳动活动和自由时间的真正满足具有丰富的意义。”“对这种传统来说,最重要的是改变表达需求和满足需求的方式,而不是确定或预先确定一套可替代需求本身。”“新的需求结构是性质上不同的生活条件的产物,因而不能预先加以确定。”<sup>[10](p105)]</sup>

也就是说,在莱斯看来,对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社会主义替代包括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一是消费

领域,二是生产领域。一方面,人们的基本需求是多方面的,满足这些需求的手段更是极其丰富,根本用不着非要由过分专门化的商品和服务来提供。“就个人活动而言,替代方案的满足前景将与克服提供商品和劳务的劳动的极度专业化和克服由此而产生的商品交换领域的局限性有关。”<sup>[10] (p106)</sup> 另一方面,不断增加的物质消费并不等于满足和幸福,也不能补偿其他生活领域中遭受的挫折。相反,消费领域之外的社会进步变革,照样能够给人们带来满足和幸福。尤其是,莱斯提出,人的满足应到自己能从事的活动中去寻找,也就是说人的满足最终取决于生产活动。“满足的可能性将主要是生产活动的组织功能,而不是像今天的社会这样主要是消费活动的功能。”<sup>[10] (p105)</sup>

莱斯认为,从消费领域转向生产领域,并非只是注意力的转移,而是要努力创造一种全新的环境。而创造这种环境的过程,就是解决生态危机的过程。因为人们从事的直接性的生产活动不仅是丰富多彩的个体自我实现过程,还将是由于切断了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联系而建立起与自然和谐关系的过程。

在莱斯看来,这样一种未来社会并不是许多人会横加指责的“原始的”、“反动的”社会或“黄金时代”,而是一个商品及其市场交换的积极作用仍将得到保持、工业化和科学技术的积极方面得到更充分发挥的“较易于生存的社会”。其核心性目标是减低把商品作为满足需要的因素,并把人均使用的能源及其他物质数量尽可能减少——这非常类似于我们今天讨论的“可持续发展”或“低碳社会”,而各种技术的使用和不同政策的制定,都要服从于这一目标。

对这种“较易于生存的社会”的基本特征,莱斯概括了两点:<sup>[11] (p432)</sup> 一是它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致力于改变现行的社会政策,使其抛弃幸福的量的标准而采用质的标准,从而应当把它看作是社会改革进程中的一个动态性阶段。二是该社会最关心的是重新配置资源和改变社会政策的方向,使满足需求的问题不再被完全看作是消费活动的功能,而不是经济形势的波动(增长或下降)。

可以看出,一方面,莱斯的未来社会方案设想是包含着强烈的生态主义意蕴的。因为,他整个未来思考的起点就是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物质生产与消费的大幅度扩张,已经使得“我们务必把人的需求问题视为生态相互作用的更大系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sup>[10] (p113)</sup> 而这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重建要求人类必须对自己的人口、需求和技术有所节制,而不是继续膨胀。另一方面,他自觉坚持了一种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环境正义”或“生态公正”立场。他明确提出,即便在工业发达国家,一切环境友好或生态友好的社会努力,也必须与逐渐克服这些国家中依然存在的特有的贫困现象的政策相一致。只有这样,向“较易于生存的社会”的过渡才会代表着一种社会的进步。否则的话,“较易于生存的社会”对于社会地位低下的人们来说,显然只是贫困的另一种形式。

### 三、阿格尔的“生态危机”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

当时任职于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本·阿格尔(Ben Agger, 1952~)在1979年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sup>①</sup>将威廉·莱斯的两部著作盛赞为对一种生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最清楚、最系统表述”,<sup>[12] (p475)</sup> 从而宣布了生态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新支派和环境政治社会理论新流派的诞生。不仅如此,莱斯及其著作,连同阿格尔本人,也都作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广为人知。对于这一“既存性”事实,<sup>[13] (p32-46)</sup> 笔者认为,有必要做一些简短的讨论,并作为本文的结语。

第一个问题,“生态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流派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确立了吗?依据在本文开篇所提出的定义,至少从马尔库塞和莱斯的相关论述来看——另一位至少同等重要的学者是安德列·高兹(André Gorz, 1924~2007),<sup>②</sup>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一个肯定性的判断:他们作为第一代生态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仅把生态环境问题的成因归结到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制度本身,而且明确提出了对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的社会主义替代是克服生态环境危机的必由之路。换句话说,从

① Ben Agger, *Western Marxism: An Introduction* (Santa Monica: Goodyear, 1979).

② André Gorz, *Ecology as Politics*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0), translated by Patsy Vigderman and Jonathan Cloud. 在这部1975年首先以法文出版的著作中,高兹明确把生态危机视为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危机的总根源,将其归因于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或“生产逻辑”并强调了社会主义的替代性选择。



马尔库塞(1972)、莱斯(1972/1976)到高兹(1975),他们在把法兰克福学派对发达工业社会的哲学文化批判转变成为一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批判的同时,把古典马克思主义意义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变成为一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生态学批判。相应地,“生态马克思主义”同时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环境政治社会理论中的一个新兴流派。

需要强调的是,鉴于当时环境挑战骤起的更广阔时代背景,生态马克思主义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传统对生态环境挑战的一种理论回应。而这种回应从一开始就包含着两个侧面或维度:一是回到或重新阐释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著述。比如,马尔库塞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读,莱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的引述,高兹对《资本论》的阐释,等等。二是批判性地吸纳新出现的各种生态主义思想或理论。而这方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马尔库塞,还是莱斯、阿格尔和高兹,都几乎共同地指向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消费主义或“过度消费”、“异化消费”,并将创建一种小规模(马尔库塞)、分散化(阿格尔)、重满足(莱斯)、少生产(高兹)的生产模式或架构,作为未来生态的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这当然可以解释为当时盛行的“小的就是美好”的等生态激进主义思潮对于这些第一代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但事实恐怕远非如此简单。同样有意思的是,莱斯和高兹还都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掌握着科技知识的群体,前者要求“使那些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的收入有所节制”,而后者则公开宣称科技工作者是享有等级制特权的“神秘化的工人”。<sup>[11]</sup> (p432-433, 363-365) 初看起来似乎有些匪夷所思,但至少从他们论述的语境来看确有其精辟之处。

第二个问题,与马尔库塞的“自然危机”和“自然解放”理论相比,莱斯的“自然的控制”和“较易于生存的社会”理论,是否以及在何种意义上是一个更系统或更具创新性的理论体系?笔者的看法是,无论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自然危机”、“生态危机”成因的概括,还是对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的归纳,作为批判理论第一代成员之一的马尔库塞都不比莱斯逊色,尽管后者对于发达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大众消费主义的批评的确更为突出些。依此而言,陈学明教授无疑是正确的,即把马尔库塞作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代表人物来加以论述(同时也承认莱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之一的地位)。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马尔库塞还是莱斯的理论阐发,都与随后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者有着明显不同。正如莱斯在《自然的控制》附录的“技术合理性:马尔库塞及其批评者”一文中所分析的,马尔库塞对技术合理性的社会含义的讨论,依然是在理性及其批判的总体框架下(技术合理性、个人合理性和批判合理性)展开的。这就使得,他相关阐述的生态意涵往往隐蔽于较为抽象晦涩和警句化的表达之中,而很少看到如下般清晰的表述:“这一统一是以解放为前提的:革命的实践,应该废除资本主义机构(制度),并用社会主义的机构(制度)和关系代替之。”<sup>[2]</sup> (p140) 同样,莱斯对自然控制和满足极限的解析,也是在一个非常复杂的批判理论分析框架之下完成的。实际上,他是通过对自然控制/统治观念的萌生、演进和意识形态化异化(从积极性到消极性的转化)的批判性追溯与分析,来阐述新历史条件下自然控制/统治观念应主动转向自然的解放的(通过人的和解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而无论是马尔库塞还是莱斯,都相信技术成为一种解放自然的技术和社会成为一种自由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也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他们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立场和地位。“资本主义,无论多么数学化和科学,仍然是对人的数学化的技术的统治;社会主义,无论多么科学和技术,也是建设或推翻统治。”<sup>①</sup>

第三个问题,阿格尔对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开创性贡献是什么?笔者认为,他除了宣布“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并预言20世纪“80年代的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可能会表现为一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sup>[12]</sup> (p414-415) 便是明确地把生态危机与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联系起来。“这种生态危机论,或我们所说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限制工业增长的迫切要求将形成重大的政治压力,这些压力也许会迫使人们对工业资本主义文明的目标和方法进行彻底的重新评价”,这种生态危机理论“并没有像植根于国家分析的新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那样受到明显的关注,但其重要性并不亚于它”。<sup>[12]</sup> (p419-420)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从不同的、更深一层的发达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理解矛盾的。它把矛盾置于资本主义生产与整个生态系统之间的基本矛盾这一高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张主义动力

① Herbert Marcuse, *Negations: Essays in Critical Theory* (Boston: Beacon, 1968) p. 215.



由于环境对增长有着不可避免的、难以消除的制约而不得不最终受到抑制。”<sup>[12] [p421]</sup>应该说,这种双重危机或矛盾(即“资本主义的内在结构矛盾”和“发达资本主义加深异化、分裂人的存在、污染环境以及掠夺自然资源的趋势”)的提法,已经为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日后阐述的“资本主义双重基本矛盾理论”<sup>①</sup>埋下了伏笔。

然而,至少在理论著述方面,笔者认为,阿格尔恐怕难以与马尔库塞、莱斯和高兹相提并论。他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讨论,更多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客观性趋势而言的,而他坚称的作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独创之处的“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the dialectic of shattered expectations)如何能够成为“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有力的动力”,尤其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设计将会打破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控制的社会主义的未来”,<sup>[12] [p490-420]</sup>一句话,实现生态马克思主义与美国民粹主义传统的“嫁接”,是存在着太多疑问或不确定性的——“商品需求方面的破灭了的消费者期望”与“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批判的破灭了的期望”之间有着远超出我们想象的距离。<sup>[12] [p519]</sup>事实上,除了年轻时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一书,阿格尔几乎没有任何独立性的生态马克思主义专著。而且,从他漫长的学术生涯来看,阿格尔似乎也没有再回到生态马克思主义这一主题。相反,多少有些吊诡的是,也许是他更持久地坚持与推进了法兰克福学派所开创的社会批判与后现代传统。<sup>②</sup>

#### 参考文献:

- [1] James Jackson. *The concept of Eco-Marxism* [EB/OL]. [http://environmental-activism.sute101.com/article.cfm/the\\_concept\\_of\\_ecomarxism](http://environmental-activism.sute101.com/article.cfm/the_concept_of_ecomarxism) accessed on 13 July 2010.
- [2]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等. 工业社会和新左派[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3]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 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 刘继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 [4]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 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 马尔库塞文集[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89.
- [5] [德]马克思·霍克海默, 西奥多·阿道尔诺. 启蒙辩证法[M]. 渠敬东, 曹卫东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 [6] [德]马克思·霍克海默. 批判理论[M]. 李小兵等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3.
- [7] [德]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 [8] [加]威廉·莱斯. 自然的控制[M]. 岳长龄, 李建华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7.
- [9] [德]马克思. 资本论[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 [10] William Leiss. *The Limits to Satisfaction: An Essay on the Problem of Needs and Commodities* [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11] 陈学明. 谁是罪魁祸首: 追寻生态危机的根源[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12] [加]本·阿格尔. 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 慎之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
- [13] 刘仁胜. 生态马克思主义概论[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

(责任编辑: 郭荣华)

---

① James O'Connor, *Natural Causes: Essays in Ecological Marxism*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1998); 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 唐正东、臧佩洪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② 阿格尔 1994 年从纽约大学布法罗分校转入得克萨斯大学阿灵顿分校后, 先后担任人文学院院长和理论中心主任, 并出版了《加速快速的资本主义: 文化、工作、家庭、学校、身体》(2004)、《后现代化“后现代的”: 社会实践、自我和理论》(2002)、《批判社会理论导论》(1998)、《性别、文化和权力: 走向一种女性主义的后现代批判理论》(1993)和《公共生活批判理论: 衰弱时代的知识、话语和政治》(1991)等著作。